

文史研究論文選 (下)

張國光

一九八二年九月

目 录 (下)

- 《水浒》祖本探考……………(347)
- 兼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
- 《水浒》祖本非元末明初作品续辨……………(364)
- 兼论《水浒》非由词话本改编而成的问题
- 《忠义水浒全书·发凡》内容辨伪……………(381)
- 鲁迅的“施耐庵”为繁本《水浒》作者之托名
- 说无可置疑……………(394)
- 兼析关于施耐庵的墓志、家谱,诗文、传说之俱难征信
- 《水浒》是由“元人施耐庵”“纂修”的吗?……………(412)
- 与王利器先生商榷
- 《水浒》版本“由简到繁”论质疑……………(426)
- 与聂绀弩先生商榷
- 金圣叹是“《水浒》最凶恶的敌人”吗?……………(441)
- 读聂绀弩先生《水浒五论》质疑
- 兼为容与堂本“伪李评”一辩
- 古代作品中最伟大的贫雇农形象——李逵……………(455)
- 从对李逵的歌颂和加工美化

看金圣叹的政治倾向

金圣叹的民族意识发微……………(474)

——读《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异议

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纲领……………480)

——《读〈第五才子书〉法》评述

* 重评杨嗣昌、卢象升等关于对清议和问题的政见之争……………(495)

——明清关系研究之一

* 李自成出洮州塞，过雪山，远征河州考……………(515)

——《李自成年谱并考证》摘记之一

* 李自成在湖北抗清牺牲经过及其墓葬问题……………(533)

湖北通山李自成墓非伪托辨……………(565)

——对《九宫山闯王陵观后质疑》一文的评析

驳李自成夹山为僧说……………(574)

驳所谓李自成“退隐湖南石门夹山为僧说”……………(577)

关于《李岩质疑》的质疑……………(598)

[附] 李文治先生来信及说明

新版《鲁迅全集》注释还应精益求精……………(616)

——关于《水浒》与金圣叹条目注文的商榷

谈李自成形象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637)

(注：有*号者系与其他同志合写的文章)

《水浒》祖本探考

——兼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

水浒究竟成书于哪一朝代？著作者为谁？这是多年来聚讼纷纭的一桩学术公案。

郑振铎在《水浒全传·校勘记》中说：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刻的《忠义水浒传》二十卷（残本）“为仅存之《水浒》最早本”，这是不错的。但它是否就是《水浒》的祖本？更进一步，它是根据已经流传的抄本付刊的，还是由郭勋指使人编著成书，并出资付刻的呢？

根据我的研究，郭刻本就是《水浒》最早的刻本，它其实就是郭勋的门客执笔的，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即十六纪三十年代初。

《水浒》非宋元或明嘉靖以前作品

郑振铎以为《水浒》是逐步扩充成书的，南宋已出现《水浒》的底本，元时出现施耐庵本，元末出现罗贯中本，而后才有嘉靖间“郭勋（？）据罗书重加润饰”改编的百回本。他认为郭本的出现已是《水浒》的第四阶段，所以又绘了一幅《水浒》故事逐步扩大图（见《水浒传的演变》）。聂绀弩也据此说《水浒》“是集体创作，因而不是一个人写的。”（《水浒是怎样写成的？》《人民文学》1953年6月号）拙见以为，《水浒》的定本乃七十回本。百回本、百

二十回本只能代表《水浒》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若就它的最原始的本子而论，无早于郭刻百回繁本——《忠义水浒传》者。此本就是我国最早的长篇白话小说。诚然，它的创作并非纯凭作者一人的构思，而是汲取了许多资料，例如《容斋随笔》、《宣和遗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序赞》、元杂剧以及宋元人的话本、笔记、诗词等。但是，这些都只对《水浒》提供了若干材料，不应把它视为《水浒》的前身。更不应因为《水浒》的人名、事迹、情节有些与上述材料相同，就把《水浒》的成书也前移到宋元时代。

为什么说《水浒》郭本不是明以前的作品？因为：（一）书中不少地名都是明代的建制。如元并无山东行省，而吴用却自称“祖贯山东人氏”；书中提到济州、泰安州时，前面都冠有“山东”字样。又东昌、兖州之设府，都是洪武年间的事（《明史·地理志》），而《水浒》中东昌、兖州均称为府，即是明证。其六十六回说“年例北京大张灯火庆赏元宵……全似东京体例”；又说“依东京体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灯五夜”。这其实是说明代的北京对北宋东京的模仿。其诗云：“……北京三五风光好，……银花火树不夜城，烛龙衔照夜光寒，人民歌舞欣时安。”这显然是歌咏明代的北京城。而《宋史·地理志》：“河北路，大名府魏郡，庆历二年建为北京。”试问宋的大名城，怎么会有上述盛况呢？再说，明的北京在宋为燕山府，而燕云十六州，五代早已是契丹占领区了。直到1123年，宋才从金人手中赎回燕山等六州空城，但转瞬又沦入金人之手。它哪里有仿汴京之例大放元宵灯火的可能呢？

又，明的北京，即元的大都。于至元十九年置留守司。

《水浒》称北京留守司而不称“大都留守司”，也是作者非元人而是明人之证。此外《水浒》称花荣为应天都统制，此应天府也必是明的应天府。因宋的“应天府本唐宋州。”

（《宋史·地理志》）。而明的应天府（今南京），系朱元璋所建置（《明史·地理志》）。前者向不出名，后者则为明人所习知。

（二）宋是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时代，它历受辽与金的侵侮，这是稍有民族意识和历史知识者都要为之扼腕愤叹的。然而郭本作者却对这一史实毫无所知、所感，反而无中生有地描写了宋在平方腊前征辽的巨大胜利。不知1123年宋是在镇压方腊以后才命童贯率师北伐。但白沟之役，宋兵一触即溃，旋即班师；1123年才以向金输岁币四十万，另年输代税钱百万缗的条件，从金人手中换得燕山六州空城。小说却不以此为宋朝之耻，反而吹嘘宋江当了破辽兵马都先锋，并最后迫使辽统治者对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难道任何北宋末或南宋的有识之士，会如此自欺欺人吗？

何况《水浒》根本没有写契丹，女真贵族对宋朝的欺凌胁迫，没有反映辽金统治区人民的灾难。它总是称金为“大金”，还称曾头市的大恶霸云：“这老子乃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又颠倒史实说在辽被灭以前，金国人曾长者早已占了曾头市。对历史如此无知而又缺乏民族意识，这说明作者不仅不是宋人，而且也未曾经历过元朝的民族压迫，故也不会是明初人。

（三）明初以前从无人提到过《水浒》，而所有可考的早期述及《水浒》的文献，均出于嘉靖以后。以朱有燬于宣德初（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写的《豹子和尚自还俗》为例：

它叙及梁山泊的头领时，只说是三十六人，而没有七十二地煞星之说。还说宋江是在发配江州牢城营途中经过梁山时，由晁盖把他救上山了。晁盖是在三打祝家庄时身亡的，晁死后，宋江就继为领袖。其内容情节，均与元杂剧相同，而与《水浒》所叙者迥异。可见到明宣德时，尚无《水浒》流传。

再说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水浒》版本，既以嘉靖郭刻本为最古，而明人读评《水浒》的文章的时间上限，也都不超过嘉靖初年。例如最早著录《忠义水浒传》的高儒的《百川书志》，其序作于嘉靖十九年。另外，收有《忠义水浒传》及《水浒传》二目的《宝文堂书目》的著者晁琛，嘉靖二十年才中进士；而《书目》在《水浒传》条下有注云：“武定版”也是晁书成于郭本出版以后之证。又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提到“《水浒》叙宋江等事”，但此书也不会比晁书更早。因为田汝成虽是嘉靖五年进士，而《志余》乃是他晚年归隐后的撰作（《明史》本传）。至于郎瑛的《七修类稿》（有嘉靖四十五年陈善序）和王圻（嘉靖四十四年中进士）的《续文献通考》，虽分别叙及宋江和《水浒传》，但此两书均写成于嘉靖之末，尤不待辩。另外嘉靖三年贬于云南的杨慎《升庵品词拾遗》中引《瓮天脞语》述及宋江所吟的“六六雁行连八九”一词，也当是郭本《水浒》流传以后的事。因为杨慎虽于嘉靖三年中进士，但他“老且寿”，至三十八年才死。《明史》本传称他“既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又称他“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所以《拾遗》也当是他晚年之作。

此外，李开先《词谑》云：“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

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这条资料也不能作为《水浒》成书于正德时或正德以前之证。因所谓二十册恰与郭本之分为二十卷合。又李开先所著传奇《宝剑记》（有嘉靖二十六年序）所写林冲故事大体和今本《水浒》相似。其中李逵的自白“家住沂水董店东，杀人放火惯行凶”和天都外臣序本第四十三回回前诗“家住沂州翠岭东，杀人放火恣行凶”句正合。《水浒》中朱贵又说：“这李逵他是本县百丈村董店东住。”所以，严敦易先生说：“这分明显示了李开先当时所参考的并曾袭用了两句诗的《水浒传》是和天都外臣序本同出一源的。”（《水浒传的演变》）其实和天都序本相仿佛，也就是传奇袭自郭本《水浒》之证。

既然李开先曾袭用郭本《水浒》编传奇，那他在《词谑》中所评的《水浒》自必也是郭本。再检《明史·文苑传》：王慎中，初号遵岩居士，举嘉靖五年进士。”此后，“四方名士唐顺之、陈束、李开先……熊过……辈咸在部曹，慎中与之讲习，学大进。十二年稍移吏部为考工员外郎，进验封郎中。”可见王慎中、李开先等名士在一起讲习的时间，恰在嘉靖十二年前后，这也说明他们的品评《水浒》当是新撰成的郭本。

（四）从文学进化的观点来看，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我国白话文学发展至成熟期的一个标志。因此它的时代就不会早于明中叶。郑振铎也说过“嘉靖本《水浒传》乃是《水浒传》最完美的一个本子。”他也认为：长篇小说到了这个时候，“正是黄金时代的开始，《金瓶梅》、《西游记》、《封神传》与《西洋记》也后此不久便出现。白话的

技巧已臻于纯熟而超雋之境，一切的叙写描状，都深邃而婉曲，精悍而活泼，真切而完美”。这也等于承认了在嘉靖以前不可能出现白话文技巧如此高超的《忠义水浒传》。

(五)《水浒》受《三国演义》影响甚深，如在六十五回歌颂“古来豪杰称三国，勇士超众独关羽”，并塑造了一个关羽的化身河东大刀关胜。特别是它的九十一回还写道：

……在人丛里听的上面说评话，正说《三国志》，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当时有云长左臂中箭，箭毒入骨……关公大笑道：“大丈夫死生不惧，何况只手？不用铜柱铁环，只此便割何妨。”随即叫取棋盘与客奕棋，伸起左臂命华陀刮骨取毒。面不改色，对客谈笑自若……。

试检读元《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就可见它写此事甚略，而且连标题也没有，显然不是《水浒》之所本。而明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则不仅有《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标题，且文字与引文字一致。据此可见《水浒》是承袭演义本而非平话本。而演义本修髯子的《引子》写于嘉靖壬午（即元年，1522年），是为《水浒》成书在此以后之证。

《忠义水浒传》为郭勋指使其门客所编写

以上我们论证了《水浒》不会作于嘉靖之前，而郭刻本又是它最早的刻本，这样，《水浒》与郭勋的关系就值得深入研究了。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说：

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

说“其家所传”，实际就是说它来历不明，而以前并未为人见过。“好文多艺”更是微词。事实上沈氏早已洞悉郭勋是个惯于借编刊小说以搞政治投机的官僚政客，他说：

郭勋以附会张永嘉大礼因相倚互为援。骤得上宠，谋进爵上公。乃出奇计，自撰“开国通俗纪传”，名《英烈传》者，内称其始祖英战功几埒开平、中山，而鄱阳之战，友谅中流矢死，当时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演唱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上因谓英功大赏薄，有意崇进之。会勋入直选青词大得上眷，凡出陆武惠、仇咸宁之上，遂用工程竣工，拜太师，后又加翊国公世袭，则伪造纪传与有力焉。此通俗书今传播于世。

按开平王即常遇春。陆武惠即《明史·佞幸传》的陆炳，死谥“武惠”。仇咸宁即仇鸾，他得宠于世宗，甚至有过于严嵩。《佞幸传》云：世宗崇尚道教，常在宫中设醮，并命大臣撰青词（道教祭天帝之词），而郭勋所撰颇中世宗之意。无怪《明史》本传说他“桀黠有智数，颇涉书史”了。象他这样有一定文采而又善于利用编书搞政治投机的大官僚，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指使他的门客编刻一部《忠义水浒传》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事。

戴不凡在1980年出版的《小说闻见录》中，也疑《水浒》系郭勋或其雇佣文人之作。虽言之未详，但所引的沈国元《皇明从信录》中的如下诸语，却有参考价值：

嘉靖十六年正月，进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庙。按嘉靖十年间，刑部郎中李喻进诚意伯刘基侑祀高庙，位次六王

至是武定侯郭勋欲进其立功之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

□□□《（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传说官禁，动人听闻，已乃疏乞祀英庙。

这是说郭勋在嘉靖十六年以前就命他的门客仿《三国志演义》及《水浒》编了《英烈传》，以夸大其祖先郭英的功勋。由此不难想见，《水浒》成书于《英烈传》之前，是在《三国演义》的直接影响下编写的。

那么，郭勋指使门客编写《忠义水浒传》的依据的是什么？编写的直接目的又是什么？这里不妨举出宋江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和书内极力宣扬道教的教义，试作如下论证。

每一个细心读《忠义水浒》的人，总难免发出这样的疑问：宋江既然是农民军的领袖，为什么一点草莽气也没有？鲁迅就曾注意到元陈泰在《江南曲序》中说宋江之为人“勇悍狂侠”之语。还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初稿《小说史大略》中写到：

元人剧曲亦多取梁山泊故事为资材，而性情节目，间与今本《水浒传》殊异。（《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79年第4期）

可知元人剧曲中“勇悍狂侠”的宋江，是不会宁被刺配而不愿上梁山的；他上山以后也不会镇天价唠叨“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但《水浒》作者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又为何大力宣传招安政策对王朝有利，甚至斥怀疑宋江受诏安“未保其心”的官员为奸臣呢？我们仔细研究正德朝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恍然大悟了。作者这样写并不是向壁虚造，而是有

所本的。当时确实有个农民领袖赵镒，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被裹挟参加起义的，他贯彻的是反贪官而忠于朝廷的路线，他的部下也确乎不滥杀人。《明史·仇钺传》云：

赵镒，一名风子，文安诸生也。刘七等乱起，镒挈匿渚中……遂入其党为之魁。贼专事淫掠，镒稍有智计，遂为部伍，劝其党勿妄杀。移檄府县，约官吏，师儒勿走避，还者安堵。由是横行中原，势出刘六等上。……有司遣人资招抚榜至，镒具疏附奏。言：“今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浊乱海内，诛戮谏臣，屏弃元老，举动若此，未有不亡国者。乞陛下睿谋独断，梟群奸之首以谢天下，即梟臣之首以谢群奸！”其桀黠如此。

赵镒当了刘惠部元帅之后，就改名为“怀忠”，以示对朝廷的耿耿忠心。甚至当他后来被俘被杀害前，还以不能手刃大宦官刘瑾之党焦芳父子为憾。这和《水浒》中宋江的思想不正好合拍吗？

与赵镒同时，还有一个在革命不断胜利的形势下，上了招安政策的当，而自愿投降的农民领袖刘六。我认为，正是这个人物作了赵镒的补充，和赵镒共同充当了宋江形象的模特儿。

这时恰好有个招安刘六（刘宠）却被其他官员谗害下狱而死的马中锡。《明史·马中锡传》有一段记马中锡奉诏与张伟南征刘六的文字：

（刘宠）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中锡虽有时望，不习兵。伟亦纨绔子，见贼强，诸将怯，度不能破贼，乃议招抚……会宠等闻边兵且至，退屯德州桑园。中锡

肩輿入其营，与酒食，开诚慰谕之。众拜且泣，送马为寿。宠慷慨请降，宸（刘七）乃仰天咨嗟曰：“骑虎不得下，今奄臣秉国，人所知也。马都堂能自主乎？”遂罢会，而是时方悬格购贼，宠等侦知之，益疑惧，径去，焚掠如故。这说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实行过招安政策，这种政策确实能够分化、瓦解已呈星火燎原之势的农民起义。因此，我以为《水浒》的写宋江是借鉴了历史上的同名人物的事迹，又主要是以正德时的某些走投降道路的人物、事件为蓝本的。

《明史·功臣世表》：郭勋在正德三年（1508年）已袭为武定侯，同年，“镇两广屡兼军府，四年八月神机营管操”本传还说他于“世宗初掌团营”。他是一个世袭贵族，和明王朝有休戚与共的关系，对正德及嘉靖初此伏彼起的人民武装斗争，怎么会视而不见呢？

嘉靖四年余珊上疏说：自逆（刘）瑾以来，“有刘、赵蓝、鄢之乱。……近年……江淮母子相食，豫充盗贼横行，川陕湖贵，疲于供饷。田野嗷嗷，无乐生之心。”（《明史》本传）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使郭勋指使作者把宋江写成了投降主义者，用这部小说来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即对农民起义军进行分化、腐蚀，诱使其中一部分不坚定分子叛变投降，然后又要这些人作鹰犬去镇压坚持斗争的农民军。如果我们联系《野获编》说的郭勋搞了《英烈传》之后，“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演唱于上前，且谓此祖传旧本”云云，就可以推知这部《忠义水浒传》写成后，也必然会由专门演说平话的内官演唱给世宗听的。无怪乎作者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自称为“说话的”，而且使宋江的忠义色彩浓到令人不能置信的地步了。

《忠义水浒》极力宣扬道教，也是郭勋借以迎合世宗之确证。我们知道，明世宗时是道教大走红运的时代，《明史·世宗纪赞》就批评世宗：“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匱。”嘉靖三年道士邵元节被召入京，就在宫禁中大建斋醮，搞得乌烟瘴气。

郭勋也是一个道教迷信者，《明史》本传就说“妖人李福达，自言能化药物为金银，勋与相结，福达败，力持其狱”。郭勋因此在嘉靖初受到攻击，引起政治上的一场轩然大波。但他十年余后又向世宗推荐了方士段朝用。以后段朝用事败，郭勋亦因此下狱，遂瘐死在狱中。

《明史·佞幸传》云：

邵元节，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也。世宗嗣位……日事斋醮。三年，征元节入京，见于便殿，大加宠信，俾居显灵宫专司祷祀。

我以为这个邵元节就是《水浒》中攘瘟疫的张天师的模特儿。《明史·地理志》：江西广信府贵溪“西南……有龙虎山，上清宫在焉”。贵溪，元属江浙行省信州路，至明初才改为江西广信府，故作者误为属信州。

我国古代小说没有一部象《忠义水浒传》那样极端歌颂道教的，这与郭勋信奉道教绝非偶然巧合。《水浒》作者不采元杂剧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之说，却采用《李逵负荆》中“一百零八个头领”的说法；又据《燕青博鱼》剧“则俺三十六踊跃罡星”而发展到七十二地煞。这分明是把这些头领都化为道教的神将，削古来宋江领导的三十六人起义故事之“足”，以适应道教之“履”。

其第一回就写：张天师到京城普施符篆，使瘟疫全消，就是鼓吹道教是福国利民的宗教。又说：只因洪信放走被祖老天师法符所镇锁的一百另八个魔君，致使“社稷从今云扰扰”。言下之意，是违了道教法旨，国家就要大乱。

作者还把宋江写成奉玄女之命下凡来尽忠报国的大罗仙，玄女不仅赐予宋江天书，还教他“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借此宣传道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巨大作用。它又刻画了一位“神游八极之表”的罗真人，说他能使“天不怕地不怕”的李逵“只管磕头跪拜”；还叮咛李逵要“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逵也再拜道：

“敢不遵依真人言语！”这岂不是说道教能降龙伏虎么？

《水浒》为了抬高道士的政治地位，特别着力描写罗真人能够“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弟子孙公胜，让他坐上梁山上第四把交椅，在每一个关键性的战役中，总少不了由他出来用“五雷天罡正法”破除魔法。不仅如此，宋江也能看能念“天书”上“回风返火破阵之法”的咒语和秘诀；罗真人当面赞许宋江“归顺宋朝，此清名千秋不朽”，“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宋江征辽遇到困难时，玄女叮嘱他“保国安民，勿生退悔！”无怪宋江在衣锦还乡时，特“将钱五万贯命工匠人等，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庙宇，两廊山门，妆饰圣相”了。

梁山泊排座次应该是《水浒》的高潮，而作者也就抓住这一回，集中地对道教进行渲染。宋江特建醮七天，在梁山泊设七宝三清圣像，两班设二十八宿，十二官辰，一切由主醮星官主宰。还插有什么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周天九宫八卦旗等等，使读者眼花缭乱。

其目的无非是要人们对道教虔诚礼拜。

当然它同时也宣扬了佛教，因为“三教合一”本来是封建社会的一般信条。但《水浒》是把佛教放在次要地位来写的。在小说中并没有出现一个笃信佛教居于关键地位的人物。鲁达、武松两人只是不得已用出家来掩护自己身分的。而且鲁达吃狗肉醉打五台山一回，毋宁说是对佛教的亵渎。《水浒》不仅写了象裴如海这样的坏和尚，还编造了“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以及“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官’，四个字‘色中饿鬼’”这样一些话来咒骂僧人，这不正是郭勋为了迎合世宗迷信道教的需要吗？

论郭刻本《水浒》成书年代，

兼谈其作者题署问题

郭勋在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是嘉靖九年到十九年之间。本传说：

勋怙宠颇骄恣，大学士杨一清恶之，因其赇请事觉，罢营务，夺保傅官阶。一清罢，仍总五军营，董四郊兴造。明年，督团营。十八年兼领后府，从幸承天，请以五世祖英侑享太庙廷臣持不可，侍郎唐胄争尤力。帝不听，英竟得侑享，进勋谥国公，加太师。

按《明史·宰辅年表》杨一清嘉靖八年九月致仕。可见郭勋官运亨通是这以后的事。又《皇明从信录》说郭勋是从嘉靖十年刘基配享太庙之时起，就起了尊郭英入太庙配享的念头。又说：他是仿《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来编造《英烈传》。

我们可以推知：当时郭勋先指使门客仿《三国志演义》编撰成长篇小说《水浒》，而后又在《水浒》的基础上编成《英烈传》的。《英烈传》成书既在嘉靖十六年，而这部百回本《水浒》的刻印，总得三年二载才能竣事。因此我以为《水浒》的成书当在嘉靖十一、二年（1531—1532）。《三国志通俗演义》题“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而《水浒》也题罗贯中纂修”，是模仿前者之一证。罗贯中原是元明之间的戏剧家，但他决不会是《水浒》的作者，因为元末明初不会出现长篇白话小说《水浒》，这是铁的事实。至于施耐庵本无可考，也当非真姓名，尤其不会是嘉靖时《水浒》原作者的真名，因为当时还没有公开署真名于小说卷端之例也。

那为什么要托名施耐庵呢？按《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条”记小说人有施珪，注曰“御前”。又同条记“说经诨经”诸人独多以“庵”为名（十七人中占了七人）。说小说的也有一个陈可庵。严敦易疑施珪当时必是小说名家。据此也可推知郭勋等编成《忠义水浒传》一百回后，为了抬高书的身价，就把写作的时间拉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前的宋元时代，为此又在罗贯中之外虚构了一个施耐庵。这个施耐庵很可能是由“施珪”和“庵”字拼凑成的一个假名，郎瑛的《七修类稿》，高儒的《百川书志》都称施为钱塘施耐庵，这是假托者视施为南宋杭州说话人之旁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称施为元人，罗为其门人，李贽称施罗二公（《忠义水浒传序》），周亮工称罗为洪武初人，施为元人，这都说明明后期的人和清人均以为施早于罗贯中。金圣叹也据此造为罗贯中续《水浒》之说。金圣叹的批本一出版就“盛行吴下”，而后又“风行海内”，在事实上成了《水浒》的定